

[苏] 谢瓦尔德纳泽 等著



0019313

苏联外交

反思

苏联

外交反思



苏联新思维译丛

524022



2 017 6660 5

苏联外交反思

〔苏〕 谢瓦尔德纳泽 等著
宋以敏 选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2 017 6660 5

责任编辑：薛克夫

封面设计：施本铭

苏联外交反思

〔苏〕 谢瓦尔德纳泽 等著

宋以敏 选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75 字数：232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10-9/D·18

定价：3.80元

编者的话

苏联的政治“新思维”究竟“新”在何处，其含义又是什么，这是近年来引起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极大兴趣的一个问题。三年多来，有关苏联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的新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论述。关于外交问题的“新思维”，虽然在戈尔巴乔夫的著作和讲话中一再有所阐明和发挥，并多次在苏联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得到表述，但是这方面的公开讨论一直落后于国内问题。同外交直接相关的军事问题则还没有怎么展开。

近半年多来，情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围绕外交问题的讨论趋于活跃，对外交的反思达到了新的深度。这主要表现在：某些长期存在的“禁区”开始被打破；已经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政策开始在理论上得到比较深入系统的阐述。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个标志。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院士认为，这次会议“直接面对外交政策中的缺点错误”，之后紧接着举行的外交部科学实践会议则是“外交政策讨论的里程碑”；他呼吁国防部也举办一次类似的论坛（阿尔巴托夫1988年秋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收入这本选集的18篇讲话和文章，绝大多数都是1988年春季以来发表的，其中有7篇发表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讲话和文章的作者，有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外交政策的制

定者，多数是苏联学者，其中有些对苏联外交政策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当然也并非收入这本选集的所有文章的所有论点都能反映苏联官方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讲话和文章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最近一段时期苏联外交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从表面上看，外交问题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并没有占多大比重。但是，这个会议所进一步肯定和阐发的内政外交密切相关这个命题，却表明苏联的外交反思在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已经不再限于经济落后必然影响国家的外交地位、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等一般提法（过去也可以见到这种提法）的水平，而是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同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相隔绝这种更广泛的分析。现在的新角度是，从内政外交的相同运行机制出发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据此检查过去的失误，确定今后革新方向。探究过去的外交失误，已深入到从政治体制上寻找根源，又从外交失误给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上看后果。谋求“坚决更新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在实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新的质量”是戈尔巴乔夫在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应从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着手，同时要大力改善国家形象，并且力争以全面改善对外工作来配合并促进国内各方面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以来，逐步纠正了以往领导人对于内外矛盾问题的绝对化观点，即对“内部世界”（苏联社会、“社会主义大家庭”）只看到同一性，否认对立和斗争；对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又只强调对抗性，否认联系和统一。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是，对内承认多样化，正视矛盾和冲突，对外强调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前后两种不同的认

识，可以说从根本上区分了新旧政治思维。近一时期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进一步指出，对内对外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法间存在着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苏联外交部所作的报告有一段概括的说明：国内民主化是对外关系民主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对外政策直接取决于内部事务；国内政策背离列宁主义原则，外交就会受到损害；30年代及其后，内部生活变形，就对国际事务中的路线造成严重影响。

近期苏联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围绕这个问题作了不少发挥。这本选集中有不少文章就是比较集中地论证内政外交间的联系的。这里，我们试图将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加以归纳，从中大致理出一些思想脉络。

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首先强调的是，苏联国内高度集中、依靠行政命令的政治体制，严重地影响了外交事务。

首先，外交决策的不民主和神秘化，使犯错误成为不可避免。斯大林主义给外交政策带来的非公开性坏传统，长期原封未动。领导人往往个人作出错误判断和决策。勃列日涅夫对外交更是外行。第二次大战前，斯大林对敌友两个方面，即法西斯德国以及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欧洲社会民主党，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大战后，斯大林又没有尽力限制东西方对抗的规模和尖锐化程度，以防止“铁幕”的出现，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也太绝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推进世界革命的考虑置于对战争和紧张局势危险的担心之上。几十年来执行的不是和平共处政策，而是战争边缘平衡和以核对抗相威胁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扩展势力，不考虑对缓和的影响。这些就促成了一些大国的反苏联合，使苏联陷于危险境地。在

有些问题上，并不是没有人提过正确的判断和建议，但是并没能使领导人采纳。

其次，国内缺乏民主严重地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形象和外交成果。国家形象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政府如何对待本国公民，即是否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30年代的大清洗就破坏了世界上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正和正义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奉行绥靖政策固然出于反共，但也多少同斯大林消灭大批红军指挥员有关。这种镇压使英法认为斯大林践踏了人类道德，不再是可靠的重要军事盟国。

第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在对外政策中产生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没有内外敌人便不可能有斯大林制度。冷战、紧张的国际局势，有助于斯大林对内维护镇压统治，对外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对外行为被用来为国内的政治需要服务。列宁去世后，党内进行的权力斗争，双方就都以外部危险来恫吓对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用来颂扬领袖个人，这又助长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斯大林错误地把“民主集中制”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军事行动，便是社会主义在国内发展中扭曲和变形、对外政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到极端的后果。

以上三个方面中，前两点主要是从外交的决策过程、运行机制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消极影响，后一点则涉及外交政策、路线本身。当然，外交路线，不论是推进世界革命，还是霸权主义、大国主义，都不单单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它首先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有关。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在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方面的反思，其方向同其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按照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们的说法，今天苏联外交的

基本哲学构想是：必须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要把过去的次序（消灭阶级压迫是解决全人类性质的问题的前提）颠倒过来——不以全人类利益为重，就不能指望阶级斗争获得成功；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高于一切，国家关系需要也有可能非意识形态化，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确立全人类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前者；苏联的新政治思维应该集人类社会思想成果之大成，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吸收了对立的主要思想体系的某些合理成分；只有对国内问题持多元论，才能容忍国际上的多元化表现。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给对内工作和对外工作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非军事化，认为这些不仅是国内建设的主要目标，也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国际社会进步的方向。内外工作目标一致，内部改革和对外政策革新自然紧密相连，互相促进。

民主化在苏联看来，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也是根本改善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声誉的关键，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竞赛的重要领域。在世界范围，解决民主化问题也是关键。民主化和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制度面临的共同任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扩大民主，代议制民主远远不够，还要有群众实际参与政治决策和管理的直接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实行民主选择。各国的民主化将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条件。和平共处就是国家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民主主义准则，应该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关于人道主义化，苏联强调应该恢复马列主义有关社会

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及共产主义的全人类性的价值观念。苏联学者表示，苏联已经改变了对于人权问题的态度，认为人权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和原则。过去苏联只强调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回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这是因为对后者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也因为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缺陷。现在苏联已把政治民主化以及坚决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开始注意外国的批评，不把西方对人权问题的所有批评都视为敌对的。解决社会福利、社会公正、个性自由、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两种制度的共同需要。合乎人道主义的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人道主义化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的新价值观念之一。国际关系应该人道化，人权问题已经国际化。世界政治应该帮助各国人民和政府解决这个领域里的某些重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还同各国的安全不可分，应该成为国际安全概念的组成部分。

非军事化被苏联学者们认为是今天的头号问题，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都要非军事化。在国内，要放弃对军事战略均势的崇拜，不再夸大它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转而采用合理的足够实力战略，裁减军备，使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在对外事务中，这又是苏联各种裁军建议的基本出发点。这里还涉及广义的非暴力手段。因为采取暴力形式进行社会变革，不仅对本国经济文化造成破坏，而且很容易招来外部势力的干涉，破坏国际形势的稳定，因此最好采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从事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应该有一个界限，即不得给全人类带来灾难。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提出了新的定义：防御战才是唯一的正义战争，只有

实行非进攻性防御才是使用武力的唯一正当方式。

苏联把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非军事化作为国际文明的准则，不但表示自己要在国内和国际行为中遵守，并且要在这三个方面谋求国际合作。

苏联认为，求得这种国际合作不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客观上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首先，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上已经出现一种“全球意识”，苏联的新思维已开始变成全世界的新思维。其次，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使各国的共同点增多。第三，决定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组织等量齐观。资产阶级尽管是阶级利己主义的，但也有同全人类利益相吻合的利益，在关键时刻，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超出狭隘阶级利益，以国家利益和全民族利益为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它们和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都有可能排除大规模公开暴力行动。

但是，各种表现形式的，大大小小的军国主义，却仍然是人们面临的主要危险，资产阶级的极右势力则是其中最好战的派别。

今天世界的进步力量在哪里？不能以特定的任何社会—阶级集团来划分。能最大限度地实际捍卫人类共同理想的集团和共同体，就能成为世界性革命进程的主体。在防止人类毁灭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左翼、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中派以及温和保守派力量就站在一条战线上。在其他问题上还会出现不同的力量组合。但是，在各种问题上，追求民主的力量都可以找到共同点。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党、其他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以及群众性民主运动在一起，作为权利平等的参加者，共同争取社会

进步。工人阶级对于异己的世界观应该多一些宽容。

根据这一套新想法，苏联外交的重要任务就是：寻找朋友，寻求和外国伙伴的共同点，在各种问题上寻求共同点或接触点，为国家塑造竞争者形象而消除与人为敌的“敌人形象”。

因此，苏联的外交工作也必须弃旧图新。要破除外交部垄断、封闭、自命一贯正确、把一切都简单地意识形态化等不良传统。要依法办事，不以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个人意志作为处理问题的唯一准绳。要建立拥有全权讨论国际政治问题的机制。外交部要向学术界开放，经常同部外专家进行民主交流。要允许批评，鼓励创新，注意树立有价值的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树立官衔与等级的权威。

以上简单介绍的观点，几乎全都可以在这本选集中找到出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本集子的选编工作得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赖万宁等同志的帮助，集子中的有些文章是他推荐的，谨此向他致谢。为了使各篇讲话和文章的主要观点比较醒目，我为它们作了提要（用楷体排于标题之下），加了插题（用黑体排）。由于篇幅所限，对各篇之间相互重复之处和某些比较一般的议论作了删节。

宋 以 敏

1988年12月19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改革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 (1)

外交人员必须具有新思维, 敢于

创新和坚持原则 谢瓦尔德纳泽 (8)

外交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责任和

外交后备人才的培养 谢瓦尔德纳泽 (2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和对外

政策 谢瓦尔德纳泽 (35)

探索东西方之间的新关系 达希切夫 (97)

改革, 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和对外

政策 《国际生活》座谈会 (112)

选择的自由 马拉申科 (142)

和平共处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季利根斯基 (149)

意识形态互不相容, 但是 库兹涅佐夫 (154)

和平共处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鲍文 (162)

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及其发展

趋势 奥温尼科夫 (180)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现实与幻想 基瓦 (196)

苏联对地区冲突的政策 普里马科夫 (214)

纵然荆棘丛生, 也要奋勇前进 扎格拉金 (225)

苏联与变化中的世界 伊久莫夫、科尔图诺夫 (242)

革命理论与当代	季利根斯基 (263)
新的政治思维和工人运动的一些 问题	加尔金 (284)
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和阶级利益	波兹德尼亚科夫 (304)

改革的时代

米·谢·戈尔巴乔夫

外交应服从国家的内部发展。须清除外交的过去模式和烙印。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应表现为尊重、理解和相信对方。要推动苏中关系的发展。欧洲处于苏联外交首要地位，不再从苏美关系出发看待欧洲。对亚太地区要给予新的重视。应根本改革对外经济政策。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人权问题。制定对外政策不要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观察一切。外交部不应处于批评与监督之外。外交人员不可过于自信和自我安慰。

《苏联外交通报》编者按：1986年5月23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现将戈尔巴乔夫讲话中阐述苏联外交工作改革部分的主要内容发表如下：

米·谢·戈尔巴乔夫向苏联外交工作人员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把他们的工作转向当代轨道，显著提高这项工作的质量，改进它的创造性内容、风格和方法。

外交应同国家利益密切结合

他指出，包括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在内的外事战线的全

体人员必须同全国共呼吸，必须把我们的外交活动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的外交应当有助于国家的内部发展。苏联外交的任务是保障和平，没有和平，一切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苏联外交还要尽可能为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倘若某一位大使或外事战线的其他工作人员认为，社会加速发展的问题与他无关，是旁人的事，那他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了。不，这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外交人员应当推动世界发展，以使我们在这种发展下能够促进改变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更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

戈尔巴乔夫同时强调指出，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联系是两方面的。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内所经历的困难不能不影响到它的外交地位。敌人曾企图阻挠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当年新的“冷战”浪潮取代了缓和的一个原因。现在，我们的国内事务已经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国际形势也有了某些改善。

要记住二十七大作出的结论：没有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就不可能保持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对外工作取得成功的钥匙，在于后方的可靠和稳固，在于苏联社会和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戈尔巴乔夫指出，外交机构的一项迫切任务是，促使二十七大制定的战略目标付诸实现。代表大会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就要尽快地把大会的决议和方针变成具体的外交行动。

苏共中央总书记指出，要让新思维在外交中也能占统治地位，要让外交与时代同步前进，大力清除陈旧的模式和过去的烙印，这一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正在全国进

行的改革同外交人员也有十分直接的关系。这要求每个外交人员具备高度的创造精神、实干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

苏共中央将严格检查外交机构改革进行的情况。在西方不择手段地破坏我们的和平攻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真正活跃的、卓有成效的、战斗的外交。

戈尔巴乔夫要求外交工作的形式和内容都要“现代化”，要求外交工作面向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把党的决议贯彻到外交职业活动中去，要使外交机构完全符合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和苏共二十七大的要求。

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世界发展和苏维埃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具备以尊重和平等待人为特点的新质量

他强调指出，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应居于优先地位。同时，还提出必须注意把这种关系建立在尊重它们的经验和尊严，理解民族特点，相信它们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能力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重要的是要克服我们某些外交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偏见、骄傲自满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应当谦虚。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应具有具体的和非形式主义的性质。最高级领导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级别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应当认真地吸收盟国——哪怕是一些最小的国家——参与我们的共同事业，事先同它们协商对外活动的实质，在对外政策领域内协调兄弟国家的努力。

他指出，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

因，苏中关系对世界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任务在于要推动苏中关系的发展，从而促使和平得到巩固。

苏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在贯彻二十七大关于建立普遍的国际安全体系基础的决定和实施1986年1月15日我们提出的建议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巧妙的和耐心的工作是十分迫切的事情。这方面的斗争将是艰巨的。军国主义集团不会心甘情愿地停止军备竞赛。

必须认真注意，使我们旨在裁军和限制军备竞赛的原则性建议能在最短的时期内在有关的谈判中形成具体建议。在这个领域内也不允许言行脱节。

不再通过苏美关系来看待欧洲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欧洲方面开展工作的新任务。欧洲方面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他指出，在这一工作中曾经有过一些缺点。他强调指出，必须克服思维的惰性。当我们谈到欧洲时，这里有一个提法是适用的：苏联不是通过同美国的关系这个多棱镜来看待欧洲的。这完全不是对美国的作用估计不足。

苏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在对待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问题上我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立场。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对这个组织采取的新的原则性态度付诸实施。

戈尔巴乔夫专门谈到了要为维也纳会晤做好认真准备的重要性。我们为此有良好的基础。在会谈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勇气。

亚太地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

苏共中央总书记阐述了在亚太方面的工作任务，二十七大确定亚太方面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是一个主要方面。他指出，同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国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